

论闽南小刀会起义在会党史上的地位

邵 雍

1853年爆发的闽南小刀会起义是近代会党在对外通商口岸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它不仅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在闽南地区的统治,而且很快引起了其它通商口岸和台湾地区会党群众的连锁反应,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席卷江南半壁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本文着重阐述这次起义对台湾会党起义和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影响以及它在会党发展史上所提供的新鲜经验和深刻教训,用以说明闽南小刀会在会党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对台湾会党起义的直接影响

台湾和闽南大陆有着十分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漳泉一带的粮食供应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台湾。对台贸易是厦门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少闽南人冒险渡海去台谋生,逐渐形成了“台民大半皆漳泉寄籍”的人口结构^①。在乾隆时期台湾已经出现了“田地大半归于富户。商贾生理之外,其次无田佃耕而食,其次无佃雇工而食,其下扛挑而食”的局面^②。到道光年间台湾更是“生齿日繁,无业可以资生”^③。由于台湾在地理上远离清政府的统治中心,吏治较全国其他地区更为腐败。对此台湾人民一再掀起反抗斗争的浪潮。1853年6月初,在闽南小刀会起义的高潮中爆发了林恭等人所领导的会党大起义。

1853年5月下旬,在吴青、吴阿班等人鼓动下,凤山会党首领林恭已决定发动起义,并约会杨汶爰在中路台湾县(今台南)、张佑在北路嘉义同时举义。6月初林恭在阿里港首先发难,4日率众攻破凤山,打死县令王廷干等四十余人。当天杨汶爰率领的中路起义军在湾里街与清军交战,两天内击毙县令高鸿飞等一百五十余人,旋会同林恭起义军围攻台湾府城。与此同时,张佑起义军也在北路出动二、三千人连日围攻嘉义县城。7月初林恭率五千余人南返凤山迎击清军,7月12日起义军战败,由凤山退往东港。同一天清军击败了正在围攻斗六门的嘉义起义军。14日中路起义军设在湾里街的元帅府被敌焚毁,元帅罗阿沙率部投入北路起义军,继续战斗。至8月底各路义军相继失败,起义首领大部牺牲。但北路起义军余部赖唇等的反清斗争一直持续到1854年5月。

台湾会党起义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鼓舞下爆发的,北到嘉义,南至凤山的各路起义

①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卷二页二十八

②陈盛韶:《问俗录》卷六

③姚莹:《上督抚请收养游民议状》(道光十八年)《东溟文后集》卷三页五

军均“假粵匪朱添得伪号，各处煽惑”，^①人数达数万以上。闽南小刀会等会党起义吸引了福建清军的大部分兵力，为台湾会党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台湾道徐宗幹在奏报中明确指出，林恭等人“传闻粵匪倡乱已久，近日漳州厦门小刀会匪各处滋扰，台属商民皆漳泉寄籍，乘此人心惊惶，想内地兵饷一时不能兼顾，分股竖旗煽惑，谋为不轨”。^②

闽南小刀会为策动和支援台湾会党起义做了不少工作。1853年5月19日即小刀会攻占厦门的第二天，起义军就“分遣数千人前赴泉州及台湾北方，预期与各该处属于小刀会的居民会合行动。”^③5月间“混入商船水手来台”活动的小刀会会员吴阿班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员，吴阿班抵台后立即和凤山会党头领吴青接上关系，并在凤山会党树旗起事后，出任起义军的“总先锋”。在此前后，闽南小刀会还决定由经常在台湾海峡活动的纪猫生招集人众，预定于8、9月间从海上“来台接应各股首滋事”。^④1853年7、8月之交，很可能是得悉台湾会党起义在清军的残酷镇压下已处于危急关头，小刀会提前连续派出包括纪猫生在内的五批人员渡台，每批约十余人。但因清朝台湾当局事先获悉情报，在沿海一带加强了水陆戒备，此次进援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五批援台小刀会众先后在台湾西海岸东港、鹿港以及附近海面上被清军查获。闽南小刀会在此之后并未放弃支援台湾会党起义的努力，8月中旬后复派出一批船队，携带炮械，驶赴台湾，驶至澎湖洋面时遭到清军水师的炮火袭击，损失多船，林略等三十余人被俘^⑤，蔡辛等另一批小刀会众二十四人也在台湾鹿港一带被俘。^⑥而这时从凤山到嘉义的台湾西海岸的会党起义也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了。

但无论是台湾海峡的重重波涛还是清军的水陆拦截，都无法阻挡小刀会的渡台活动。1853年8月小刀会会员吴松、余立二人在闽南战斗中被清军击散后，“由偏僻小港偷渡来台”，与噶玛兰厅的会党首领吴磋等人会面，共同“起意结党”，联合由番界小路逃来的西海岸各路起义军余部，“在梅洲庄空庙会齐，饮酒立誓”，起事反清。9月16日起义军击毙带兵前来镇压的通判董正官等多人，次日起义军乘胜攻打厅城。吴松、余立作为起义军的军师参加了进攻厅城等战役。不幸在战斗中被俘牺牲。吴磋率部先后焚攻头围，拒守内柑脚。1854年3月25日清军攻陷中心岩据点，吴磋被俘牺牲，斗争才告结束。^⑦

由于台湾会党起义是在闽南小刀会的直接影响、策动下进行的，起义中又有闽南小刀会成员的参加和策应，因此在起义军的旗号、称谓、口号等方面留下了一些闽南小刀会的印记。据清朝官员陈庆镛奏报，闽南小刀会“贼首一为同安锦宅人黄姓，伪旗书写汉大明天德殿前统兵大元帅。一为厦门港仔口人洪姓，伪旗书写大明天德殿前二公司”。而台湾起义军“旗号皆写大昌天德殿前元帅。”^⑧查“殿前”职衔始于五代的后周。赵匡胤曾任殿前都检点，宋代有殿前司。闽南小刀会首领把“殿前”一词写入旗号之中，体现了这次起义“反满兴汉”的色彩，台湾起义军沿用“天德殿前元帅”一词可能就是受了闽南小刀会的影响。

闽南小刀会首领不仅把“天德”一词写在旗号上，并用作年号，而且提出：“朱天德与

①咸丰三年五月初十日恒裕等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军录》

②《军录》咸丰三年六月十八日徐宗幹折

③转引自黄家谟：《英人与厦门小刀会事件》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第331页以下简称《集刊》

④《军录》咸丰三年七月初十日徐宗幹折

⑤参见《军录》咸丰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王懿德折

⑥军录咸丰三年九月初九日徐宗幹折

⑦军录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日邵连科等折

⑧陈天镛：《箴经堂类稿》卷三页二十八、页三十一

洪秀泉，系属妻舅之亲。……太平天国系天德王之号也”。^①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误认太平天国属于天地会系统；二是将朱姓与天德联在一起并称，这个提法在会党史上是罕见的。无独有偶，台湾会党起义军对太平天国也有类似看法，也同样使用了朱天德这一名号。清朝官员在上报审讯台湾起义军俘虏时说，林恭等人“穿戴黄色衣帽，雕刻镇东镇南各元帅伪印，分立各色旗帜，假粤匪朱添得伪号，各处煽惑，四路号召，以期分股滋扰”。^②其中“朱添得”当是“朱天德”传闻之误。由此可见，台湾会党起义军对太平军的认识和朱天德名号的采用很可能是通过闽南小刀会会员的媒介传过去的。

闽南小刀会起义重提“反清复明”口号的真正目的在于“扫净满氛，匡扶汉运”，^③台湾会党起义则更鲜明地提出“兴汉灭满”的口号^④。闽南小刀会起义军中有元帅、将军、军师、公司、旗首等头衔，台湾会党起义军中也有元帅、将军、军师、先锋旗首等名目。上述这些相似之处表明闽南两地起义同属天地会系统，前者给了后者直接的影响。以往论者评论闽南小刀会起义的历史地位时多忽略了它对台湾会党起义的重大作用，而这正是闽南小刀会的历史功绩之一。

二、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密切关系

闽南小刀会的影响东及台湾，北达上海。闽南小刀会和上海小刀会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关系和两地频繁的经济往来是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闽帮是上海小刀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海小刀会起义爆发后，旅沪的各阶层闽籍民众踊跃参加。福建水手在起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多数是粮船水手。“其时有一、二百艘福建沙船上的船伙，几乎全都是秘密会党的徒众。这些船夫参加李咸池的组织”，极为活跃^⑤。“停泊黄浦之福建糖船四十余号”接受上海小刀会的雇佣。^⑥此外据清方在小刀会失败后制订的《善后请奏条款》中透露，“闽、广蛋船、鸟船，向泊黄浦，……此次会匪倡逆，闽、广之人从乱如归，非帮同拒敌，即设法接济”；在黄浦江上“撑驾马蹄杉板小船”摆渡的“闽、广无业游民”弃“并舟从逆”^⑦。连在沪贸易的福建商人也千方百计为起义军筹集资金。兴安泉漳会馆的董事李仙云还为上海小刀会起义献出了生命。在上海小刀会首领中闽南人占有一定的比例，除前已提及的李咸池是龙溪人外，陈阿年，先锋陈阿明、林阿周，将军刘海、曾七，先锋刘进都是同安人。林阿福“原籍同安人，现澄海人”，^⑧据说他原是黄浦江上摆渡的舢板小船的“船头”。^⑨李咸池后来回厦门参加闽南小刀会起义，最后在龙溪原籍被捕牺牲。这些闽南人加入上海小刀会的起义行列，和闽南小刀会传入上海大有关系。根据方诗铭先生的考证，“一八四九或一八五〇年，小刀会在厦门重建后，很快就传入上海，其创始人当即是李仙云。”^⑩1853年5月闽南小刀会起事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对在沪的闽籍同乡鼓舞很大，他们“闻福建厦门之警，盆思乱。至夏秋之交，道路借借，言小刀会将起事

①厦门小刀会告示六纸（六）转引自佐佐木正哉编：《清末的秘密结社》第133页

②《军录》咸丰三年五月初十日恒裕等折

③《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④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09页

⑤《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以下简称《史料汇编》

⑥《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⑦同注⑥第83至84页

⑧小刀会首领名单《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第173至174页

⑨《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第88页

⑩方诗铭：《“小刀会”和“上海小刀会”起于何时》1981年1月12日《文汇报》

矣。”^① 上小刀会起义后公开宣称“和攻占厦门的人有联系”，^② 决定“建立象厦门方面过去三月所实施的社会秩序”。^③ 外国人也认为上海小刀会“和占领厦门的暴徒显然属于同一会门。”^④ 事实正是如此，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两攻太仓受挫后，“想进攻苏州，因人力尚少，”李咸池便“独自坐船由海道来至厦门，寻见股首黄位求拨鸟枪手二千名”，旋又在厦坚持斗争直至小刀会撤出该岛后才回龙溪原籍。^⑤ 闽南小刀会不仅答应支持李咸池，而且在撤出厦门后还计划“约期赴上海，攻犯乍浦”^⑥。乍浦原是上海小刀会重点联络的地方之一，1853年11月7日清军在黄浦轰沉“航海而来为助”的小刀会船只，俘获的九十六人“讯系建乍浦等人”。^⑦ 闽南小刀会上述作战意图，很可能是在得悉上海小刀会在乍浦活动的消息后制定的。

除了直接的联系外，闽沪两地起义军在布告方面也有不少相同点。闽南小刀会在龙溪进行反清宣传时用的是黄纸，上海小刀会起义当天下午李咸池“亦出示安民，独用黄纸”^⑧。闽南小刀会首领的头衔始终不离“汉大明”三字，上海小刀会中的闽帮首领则把“反清复明”写入布告，并坚持使用“大明”年号，长期拒用广帮在起义不久已经换用的太平天国年号。相对而言，上海小刀会中闽帮反清复明的意识比广帮强烈。拿闽沪两地小刀会的布告细加对照，亦可看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上海小刀会布告中不仅“除暴安良”、“应天顺人”、扫除“妖孽”、对违法乱纪者“国法”从事等个别词句和闽南小刀会完全一致，而且在句式上也多有相似之处：1853年6月2日“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在告示中指出，“贪官污吏，政皆流为虎之苛，竭髓吮脂，民尽叹夫鼠之硕。”^⑨ 同年9月7日李咸池的布告也谴责官府“民膏，剥民脂，”并指出“暴敛横征，野皆狼心狗行之吏，卖官鬻爵，朝尽兔头麀脑之人。”^⑩ 又如8月1日闽南小刀会首领在宣布厦门新关税时宣告“照得本帅奉旨临厦，安民非以残民，御暴非以为暴”。^⑪ 上海小刀会领袖刘丽川也在起义当天的布告中表示“照得锄奸除暴，为民非所以害民；发政施仁，戡乱非所以扰乱。”^⑫ 从闽沪两地小刀会告示的惊人相似可以推测，闽南小刀会的布告极可能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上海，上海小刀会首领们（包括刘丽川）在起草告示时极可能参考过这些反清宣传品。因此闽南小刀会对上海小刀会的影响决不仅限于闽帮，它对于广帮同样是起作用的。

闽南小刀会1853年11月主动撤离厦门岛后，清军在厦门的血腥屠杀，也使上海小刀会中的闽帮抛弃了对清政府的一切幻想，义无反顾地将反清的武装斗争进行到底。1853年12月小刀会副元帅林阿福果断地处决了进城劝降的前任知府谢继超。而当时刘丽川却有妥协的意向。^⑬ 陈阿林也对以刘丽川为首的广帮的动摇倾向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855年2月初，“陈阿林打死刘的秘书，他说他宁死不投降，”粉碎了一部分广帮的献城阴谋。^⑭ 闽帮首领同样也不相信外国人能够“防止官军克复厦门时那样的大屠杀”^⑮ 之类的鬼话。“厦门招降

①②③④《史料汇编》第36、511、53、512页

⑤《军录》咸丰三年十一月初三日王懿德折

⑥《军录》咸丰四年三月四日王懿德折

⑦《史料汇编》第177页

⑧《史料汇编》第41页

⑨《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二第897页

⑩《史料汇编》第5页

⑪休士：《小刀会叛乱》

⑫⑬《史料汇编》第4页，第514—515页

⑭参见《史料汇编》第179页

⑮《史料汇编》第514页

仍被诛戮”^①的传闻使他们对中外反动派玩弄的议抚骗局倍加警觉，决不上钩。

总之，闽南小刀会和后起的上海小刀会的关系是兄弟关系。正如厦门在台、厦、沪三地贸易中起了枢纽作用一样，闽南小刀会起义对台湾会党起义和上海小刀会起义也起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这三支起义队伍均为当时蓬勃发展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作出了贡献。

三、闽南小刀会的新鲜经验和教训

闽南小刀会起义是天地会系统的起义，然而闽南小刀会起义期间在严禁赌博和制止械斗两个方面却表现出它不同凡响的特色，很值得研究。

天地会、小刀会的会众大多来自下层社会，聚众赌博等旧社会的陋习在这些秘密会社中也有所表现。赌博是会党平时争取经济来源的一种重要手段，一些会党首领经营赌场，从中积聚活动的经费。赌博又是会党重要的活动方式之一。一些会党首领尽管对此不以为然，但为了联络感情亦参加这一活动，借此展开工作。尽管赌博在会党中有一定的机能，但由此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漳州府一带一向赌风盛行。封建统治者对民间赌博一般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漳州府的各级官吏甚至乘机勒索，公开收取赌博费。^②闽南小刀会则在占领厦门后明令禁赌。小刀会布告详细分析了赌博的危害性，指出“赌博之局一设，即输赢之势两分。为输赢之事既分，即口粮之资必竭。或毁拆楹楹，或砍伤树木，或取窃民家财物，或变卖军装器械，甚至争竞而相戕贼，失时而误事机，其流害盖有不可胜言者。”在充分说理的前提下，小刀会“出示渝禁，不准尔军兵日夜赌博。如敢放违，察出着该旗首按律治罪。”^③小刀会禁赌的果断措施在改变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类似的会党禁赌布告在闽南小刀会起义前根本没有，在闽南小刀会起义后亦属罕见。小刀会此举是难能可贵的。

可以和禁止赌博相提并论的是小刀会制止械斗的实践。在闽南小刀会之前尚无天地会成功地制止械斗的先例。相反，天地会自身因各山堂分峙，不相统一，常有械斗之举。乾隆五十一年台湾天地会大起义时，首领林爽文曾发出布告，只要归顺起义军，“无论闽粤民番，皆属百姓，更当加恤，”^④试图解决台湾人民在长期械斗中形成的严重对立，但没有奏效。林爽文是漳州人，一些泉州人则充当积极帮助清军的“义民”，最初参加起义的泉州人庄锡舍后来也投降了清朝。

闽南大地上的械斗恶习并不亚于台湾。漳泉各属异族有大姓小姓之分，同族有强房弱房之别，“往往以大姓而欺小姓，强房而凌弱房”。^⑤遇有“户婚田土细故，控之官，官累月不坐大堂，终年不结一案，于是自行掳禁，仇怨相寻。”^⑥“动辄列械互斗，展转报复，兹世不休，性命伤残，从无怨悔”。^⑦闽南小刀会起义前夕漳州地区械斗不断发生，然在闽南小刀会起义期间却未见漳泉人械斗的记载，和林爽文起义时的情况大不相同。当时一个英国人就报告说“镇压民间骚动，制止若干为报复姓氏私仇而引起的械斗”是小刀会“值得注

①《史料汇编》第181页

②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第39页

④《康熙乾隆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81页

⑤王懿德折咸丰五年二月初一日，转引自《大陆杂志》第五十九卷第1期

⑥黄爵滋：《会议查禁械斗章程疏》《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1页

⑦沈佑《舌方击编》卷五页一

意”的一项公开活动^①。闽南小刀会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颇不容易的。至于他们如何制止械斗，因缺乏具体资料，无法探究。但小刀会首领秉公审办民间诉讼事件的做法和小刀会禁止赌博以及“不准恃强欺弱”，^②不准“公报私仇”^③等规定，对防范械斗无疑是有益的。

严禁赌博和制止械斗，有助于稳定厦门的社会秩序，也是小刀会能够坚守厦门长达半年的重要原因。在这些方面闽南小刀会为会党斗争提供了新的有益的经验。

在会党发展史上，闽南小刀会起义和其他会党起义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如果说制止械斗和赌博是闽南小刀会独创的新鲜经验，那么它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失误则为近代会党留下了最初的深刻教训。

闽南小刀会在反侵略方面是不够坚决的。起义期间从未与外国侵略者有过正面冲突。小刀会于攻克厦门当晚“由城堡调来一部分军队，守卫外国商行”，“尽一切可能，保护及结好外人”。^④在厦门，“外人均得自由走动于城内，日夜各时，无阻无扰”。^⑤1853年8月小刀会在厦门征收关税的布告发布不久，英国方面即向小刀会表示不予承认，并威胁说“如有任何企图侵扰英国国民人身家财产的行动，将必立即受到坚强的抵抗。”^⑥小刀会首领黄德美在如此咄咄逼人的猖狂挑衅面前非但不予迎头回击，反而忍气吞声地表示“深知英国和满清政府订有条约，不能承认当权官府以外的其他当局”，说小刀会“无意干扰外国人”。^⑦

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在分析小刀会外事上的妥协时认为，小刀会对外国人有好感，是因为他们的六个最高领导人中有三个是英裔华人，小刀会内多归侨，为确保与海外华侨和太平天国的联络，或确保与食品供应地台湾的联络，不能不争取有比清朝更强大的海军力量的英国人。^⑧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需作进一步的探索。

首先，我们要看到闽南小刀会起义是会党史上第一次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起义，对于如何对付侵略者这样一个全新的问题，小刀会的首领们没有任何经验。他们对外妥协的倾向与他们没有识破英国侵略者的“中立”骗局很有关系。虽然早在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天京时已打出“中立”的旗号，但对会党起义来说，外国侵略者施展“中立”骗术毕竟还是第一次。小刀会攻厦伊始，英国驻厦领事馆即表示保守中立。文翰对这种“中立”的性质有过绝妙的自白。1853年5月他指令驻厦英国副领事“继续保守中立，以免中国政府解释为英国承认叛党”，并“希望中国当局能在短期内设法驱逐那群乌合之众，重在厦门建立政府”。^⑨这表明英国的所谓“中立”是以承认清政府、不承认小刀会政权为前提的。同年8月英方毫不掩饰地将此通知小刀会，声称“只要现存的中英条约继续不变，英使只承认北京朝廷派任的厦门地方官员，决不能以任何行动承认其他的厦门当局”，因此决不允许英国

①转引自《集刊》七第333页

②《小刀会始末记》

③厦门小刀会告示六纸（三）《清末的秘密结社》第133页

④美国众院档案第123号转引自卿汝辑《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108页

⑤施丹顿：《三合会史》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768页

⑥转引自《集刊》七第335页

⑦转引自《集刊》七第335页

⑧参见佐佐木正哉：《咸丰三年厦门小刀会的叛乱》《东洋学报》第45卷

⑨转引自《集刊》七第332页

商民向小刀会政权纳税。^①可见英国的“中立”完全是虚伪的。外国侵略者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玩弄“中立”骗局，一方面是威胁清政府给列强以更多的特权，另一方面是麻痹革命势力，以便日后扼杀革命。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闽南小刀会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英国侵略者当时慑于小刀会的威力，对清政府多次提出的助剿请求不敢予以理会。这使小刀会对外国侵略者产生了错觉和幻想。

其次，闽南小刀会不同于当时全国其他会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拥有相当数量的归侨会员。小刀会的一部分首领也是归侨。归侨参加小刀会起义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他们和占小刀会绝大多数的农民一样，直接感受到的是国内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倒行逆施。这就决定了闽南小刀会的斗争锋芒是指向清政府，而没有同时指向中外反动派。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闽南人民去外洋谋生，往往是“亲属介绍接踵而行，甚有举家而往者”。^②英属海峡殖民地成了他们集中侨居的地区之一。一些小刀会会员在厦门沦陷后陆续逃亡新加坡等地便是明证。因此一些归侨在闽南参加小刀会起义，其亲属却仍在英属海峡殖民地。另外厦门和英属海峡殖民地之间有着民间贸易往来。^③顾全归侨亲属和对海峡殖民地之贸易等因素都是小刀会在处理外事方面必须予以考虑的。当然小刀会在外事方面软弱妥协的根本原因当在于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认识不清。

小刀会的退让，使侵略者的气焰更加嚣张。直到小刀会撤出厦门为止，清军的饷银多次通过“夷船汇寄”，而小刀会没有从英方处收到过一文关税。由于拒不纳税，1853年英国“由厦门输出的贸易反较前一年为增加”。^④英国侵略者还应清政府的要求，对小刀会实行军火封锁，厦门德记、合记洋行的仓库内存有价值十几万元的火药，但拒绝出售给小刀会。小刀会撤出厦门后，外国侵略者撕下了“中立”的伪装，肆无忌惮地对小刀会大打出手。英国海军在海上击坏、拖走小刀会的船只。^⑤1855年冬，港英当局逮捕了准备攻打九龙的五十余名闽南小刀会会员，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宣称不容小刀会“借此积蓄军器，联群拜党，欲于本国作叛”。^⑥葡澳当局也发炮打死了小刀会著名的水师首领马义，把他的船队“分隔于两处”。^⑦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破坏小刀会的海上斗争。闽南小刀会受了外国侵略者所谓“中立”的欺骗，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闽南小刀会和外国侵略者的接触表明会党在反侵略的路上不是笔直前进的。外国侵略者是凶恶的，也是狡猾的。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有一个认识的过程。闽南小刀会起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直接与列强接触的会党起义，在外事方面上当受骗，存在缺点，我们是不应该苛求的，但指出这一点，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则是必要的。

①转引自《集刊》七第335页

②南安丰山《陈氏宗谱》，转引自《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第62页

③小刀会1853年8月1日征税通告的第十四条就是对厦门本地往来于新加坡等地的躉脚艇而发的

④转引自《集刊》七第382页

⑤施嘉士：《旅华十二年》，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第772页

⑥《太平天国史料》第517页

⑦施嘉士：《旅华十二年》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第772页